



科学哲学与经济哲学

——方法论的透视

过去 20 年里人们经历了有关经济哲学之文献的爆炸式增长。它的形式主要有专业性著作、一般介绍性的调查、论文集和致力于该领域研究的新的期刊的出现。与此同时，还一直存在着对于作为一门科学学科和职业的经济学之一般形态的全神贯注。

正如寇茨 (Coats, 1986a) 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学之一般形态这两个问题，正在被严格地予以区分。经济学方法论代表着总体方法论的一个子集，而总体方法论则是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经济学方法论的一般事项也许会远离实践经济学家的关注而出现。它与实践经济学家之间的这一距离可以在下列引言中得到较好的解释：

方法论就像是药品，我们之所以能容忍它是因为假定它对我们是有益的，但是却要悄悄地藐视它。我们宁愿为别人开出处方而并不乐意让自己服用。对方法论的学习发生在虚幻的另一世界，涉足其中的极少参与者被作为怪癖的人而接受。我们的哲学信念与日常实践只是偶尔才迎头相撞。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因为忙于成批地生产前沿理论而无暇顾及质疑这些前沿理论是否具有任何意义。

[琼斯 (Jones). 1977: 350]

考虑到暂时已经出现的发展和某一特定的夸张因素，上述引言的作者也许很好地反映出经济学界对于方法论的一般性态度，即把方法论看做是某种的确被勉强容忍但被私下所藐视的东西，或者这是相当少见的“我们的哲学信念与日常实践的迎头相撞”

与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写作相对比，对于经济学之一般形态的全神贯注提出更为宽泛的一般事项。这包括这一主题的公共立场，尤其是与政策范畴的绩效相关的部分；对涉入这一行业的新进入者的招募和培训的方法；在此学科内的资源配置反映出该行业内的奖励与控制机制

这些日常事项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与该学科的职业化完整地联系在一起，并且更为适宜地在知识社会学的框架之中得到表达。直接的联系可以在这些问题之间构成，这些问题建立在这一事实基础之上，即对于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在学科的一般立场与其方法论基础之间，存在着一种当然的联系。然而这种关系既是复杂的，又是微妙的。

经济学方法论中当前的复苏是与一套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影响相连接的，既有该学科内部的影响，又有该学科外部的影响。这已经被认为是自现代经济学浮现以来，经济学中与方法论问题相关的一般历史形式，并且当前对方法论之兴趣的复活也不例外。

在当代经济学中，当前“危机”的发展，来自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期间 [Coats, 1977；贝尔和克里斯托 (Bell and Kristol, 1981)] 形成的战后凯恩斯范式的崩溃。这已经导致一个结果，即使得与经济学科中对方法论之激烈质问相关联的理论重新评价的时期得以延长。有关反映在当前危机中的问题，寇茨已经指出：

无论何时付出努力来解决有关理论性、经验性和政策性问题的根本的不同见解，都证明是徒劳无益的，在揭示当前

论争之根源以及希望建立用于后续工作的更为坚实和可靠的
基础的双重努力之中，有一种返回到基础的自然督促。

(Coats, 1982: 311)

这一假设为经济学中方法论研究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貌似合理的“内生的”解释，并将此作为对于该学科悬而未决的状态的一种反应。第二个起作用的要素是外生于经济学的，但它已经被证明施加了非常可观的影响，它一直是科学哲学中的“危机”。这一危机，它在时间上早于经济学中当前的动乱，产生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持续批判，并且它的更为缓和的逻辑经验主义的变体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

随后的几十年已经通过扩展一系列可变换范式的努力而高度集中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知识的作用、地位和演进，尤其是科学理论的贡献，由此而使得这几十年非同寻常。这已经是一个科学哲学中史无前例之集中活动的时期，具有对所有科学，包括经济学的深远意义。

经济学方法论一直受到科学哲学所有主要进展的影响，并且正是在这两个争论领域之间的演进和相互作用中提供这一背景的，在此背景中任何贡献，包括这一研究，必须予以定位。在本章中我们提供一个（尽管是简短的）纲要，即通过追溯经济学方法论中主要进展以及它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科学哲学的相互作用来改变这一背景。

在必需之中，诸如本章这样的简短考察必须是可供选择的，作为任何一种达到普遍范围的企图，就要求一种全面而完整的研究。其中有许多观点存在，比如说布劳格（1980a）、考德威尔（1982, 1984a）、豪斯曼（Hausman, 1984）、莱德曼（1991）。在本章中，我们首先将追溯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方法论的主要进展，尤其是关注实证主义范式的主导地位。其次，我们将考察这

一范式的崩溃以及随后在后实证主义时代 (Caldwell, 1984a), 科学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中可替换方法的渗透, 它反过来又是被苏珀 (Suppe) 称为“接受的观点” (Suppe, 1979) 之灭亡的一种反应。

从演绎主义到逻辑实证主义

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 经济学方法论是被考德威尔 (Caldwell, 1982: 99) 描述为“主观主义 (subjectivism)、方法论个人主义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和经济理论基本假设不言而喻之本质的”, 或者是被豪斯曼 (Hausman, 1989: 116) 更加简洁地描述为“演绎主义” (deductivism)。这一方法论的透视最初是在莱昂纳尔·罗宾斯出版于 1932 年的专著《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中明确表达的被描述为一种“产生真正轰动的潜在杰作” (Blaug, 1980a: 87), 它从根本上是包含在西尼尔、穆勒和凯尔恩斯著作中的一系列方法论思想的延续, 在他们中间穆勒是核心人物, 他被罗宾斯看做自己的知识先驱 (Robbins, 1935: 121)。

在穆勒看来, 政治经济学的复杂性要求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只能通过演绎的方法达到。因为经济现象是由如此多的因果关系因素所加以影响的, 而且试验一般是不可行的, 归纳的方法不能直接予以应用

然而对于穆勒来说, 归纳是可以应用的, 并且必须作为建立经济学基本法则的一个首要步骤来加以应用, 而不论是技术性的还是心理性的。从这些基本法则中, 经济学的隐含意义可以在描述和界定了背景和相关环境的特定参数内得到演绎。对于穆勒来说, 经验性的证实或者认证在构建演绎的正确性, 以及判定重要

的因果关系因素是否已经被省略等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此类经验性的证实或者认证并不决定人们对基本法则的认识承诺；他们已经通过反省或者实验予以构建。通过这一阅读，政治经济学十分倚重独立构建法则的应用。正如布劳格所指出的那样：

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西尼尔、穆勒和凯尔恩斯等人身
上，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理念，即“证实”（verification）并不是一个经济理论测试，看一看它们是真还是假，而仅仅是一种构建被认为是明显正确的理论之应用边界的方法：人们核实的目的是要发现“扰乱的原因”（disturbing causes）是否可以说明顽固的事实和理论上有根据的理由之间的不一致性；如果他们做了，就说明这一理论是被错误地加以应用的，而理论本身仍然是正确的。至于有关是否存在任何其他方式用以展示某一理论是错误的问题，甚至从未被认真地考虑过。

（Blaug, 1980a: 81）

穆勒相信这些已经构建的法则为特定的因果关系因素如何运行提供了一个准确的说明，但是它们并不是放之四海为真理的法则。它们展示的是一种倾向。但是由于这些倾向从属于难以计数的“干扰”或者“干扰的原因”，它们不能在事先就被全部识别，于是“在其他情况相同条件下”之条款使得这些干扰在这些倾向之“规律”形成时，就起着关键的作用。

经济学探索了这些已建立之规律的隐含意义，但是给定干扰的原因之影响，这些隐含意义并非总是能够实现。在豪斯曼近期的著作中，他令人信服地捍卫了穆勒有关诸如经济学这样的“不精确科学”的演绎主义方法论（Hausman, 1989, 1992）。

对于豪斯曼来说，精读罗宾斯 1932 年的那篇论文从本质上

展示出穆勒立场在 20 世纪的重新表述，尽管有所夸大并且欠缺穆勒处理方法中的均衡资质无论豪斯曼为穆勒方法论辩护的相对优点是什么，他在争辩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之转换带来了经济理论及其方法论的变革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新古典理论强调个人决策的中心地位和经济活动中个人偏好的作用，在此活动中，关注的是来自市场中个人相互作用的短期配置功能。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古典经济学主要强调社会各阶级的地位以及它们的活动对长期增长和社会中财富分配的隐含意义。尽管理论强调的重点有所变动，但基本的方法论存在着延续性。虽然古典作者和新古典作者之间在理论常项方面存在着差异，比如说诸如奈特（1935，1940）、冯·米塞斯（1949，1978，1981）和罗宾斯（1935）这样的经济学家都同意穆勒关于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无可非议的，经验失误并不能对其产生质疑。

事实上豪斯曼概括了这一立场，并且争辩道：在历史上不仅诸如凯尔恩斯（J.E.Cairnes，1857）和约翰·纳维尔·凯恩斯（1891）这样的方法论作者接受了穆勒的方法论，而且“如果有人更新了语言和经济理论，那么，他就具有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无论他们在有关方法论的讨论中说些什么）依然公开赞许的观点”（Hausman，1992：124）

这一受到保护的演绎主义方法论之观点在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哈奇森《经济理论的意义及其基本假说》（1938 年）的出版而受到挑战。事实上这并非演绎主义所受到的第一次攻击，早在 19 世纪，历史学派就已经发动了针对政治经济学之抽象演绎方法论的持续攻击（Schumpeter，1954）。

在 20 世纪 30 年代间一大批作者影射了从一个类似的视角到哈奇森之视角（Hausman，1992：153）的演绎方法的缺陷。然而正是哈奇森的工作吸引了经济学界的注意力。哈奇森的工作一般被评价为试图将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中心理念引入经济学，他

本人则是于 1935~1938 年之间在波恩大学执教时对逻辑实证主义有所认识的 (Caldwell, 1982)。

在把逻辑实证主义之理念引入经济学中时,哈奇森除了抵制罗宾斯对演绎主义的重申之外,还向经济学界展示了 20 世纪初形成的现代科学世界观。正是这一世界观被苏珀在其对 20 世纪科学哲学的说明 (Suppe, 1979) 中称之为“接受的观点”。

实证主义具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变体于 20 世纪之交显现之前很久就具有对认识论的巨大影响。到了 19 世纪,实证主义已经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有关知识的认识理论,并且侵占了诸如生物学、伦理学、社会学和医学等学科在内的如此广泛的领域。用考拉考斯基的话来说,“实证主义支配了时代的精神”(Kolakowski, 1972: 122)。

哲学史学家们把实证主义看做是一种对形而上学体系建立者的一般反应,这一体系一直到 19 世纪是由黑格尔和新黑格尔体系所代表的,苏珀争辩说,逻辑实证主义主要是一场日耳曼运动并且必须置于这一背景下才能够被理解 (Suppe, 1979; Passmore, 1967, 1968)。

到了 20 世纪之交,根据苏珀的观点,在德国学术圈内流行着三个可替换的哲学思想流派:即以路德维希·布希纳的著作为代表的机械唯物主义 (mechanical materialism); 与马尔堡学派 (Marburg School) 相联系的新康德科学哲学 (neo-Kantianism philosophy of science); 以及厄内斯特·马赫的著作为基础的新实证主义 (neo-positivism)。

在这三种立场中,新康德主义是最为普遍并受到追随的,然而而是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和相对论、量子理论的浮现展示了日益流行的科学哲学的特定问题。对一种解决方案的努力基于尝试将马赫的新实证主义与博因凯尔 (Poincare) 的约定主义 (译者注: conventionalism——约定主义,是哲学中的一种流派,认为数理

等原则皆因约定的符号始能成立)进行调和,并且受数学哲学之发展的影响,马赫与博因凯尔之合成理论的重新修饰作为一种逻辑实证主义的最初版本而浮现(Suppe, 1979: 12)。

给定它所经历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和持续不断的修订,发掘实证主义的中心信条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假如我们接受了哈奇森的目标是把实证主义的某些中心理念引入经济学之中的判断,今天许多身体力行之经济学家也许仍然追随实证主义的某些变体。那么哈奇森在 1938 年所争辩的实证主义的中心信条是什么?基于当代哲学史学家对于实证主义之中心信条所进行的历史系统化,比德(Beed, 1991)已经辨析了实证主义的下列特征:

- (1) 科学知识,包括逻辑与数学,是知识惟一有效的形式;
- (2) 形而上学的申辩、规范的陈述论点、价值判断和意见不是有效的知识;
- (3) 建立在常识经验基础之上的经验数据,是除去逻辑与数学之外的有效知识的唯一来源;
- (4) 有效知识只能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获得,尤其是物理学、应用逻辑与数学;
- (5) 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除逻辑与数学之外,只能通过推理的方法从经验数据中衍生;
- (6) 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仍然是除逻辑与数学理论之外,只能通过经验数据得到证实;
- (7) 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应当以数理逻辑形式加以形式化和表达;
- (8) 规范的观点、价值判断、信仰与意见不应当进入经验数据收集、理论形式化或者证明的范围之内;
- (9) 获得有效科学知识的方法对于所有经验领域都是相同的(科学方法的统一)。

上面所展示的实证主义的中心信条,延续了波普尔的早期著

作，预示了哈奇森 1938 年的贡献 (Caldwell, 1982: 112~117)，他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集中在经济学的特定方面，对此他清楚地看做是根本上有缺陷的。他对理论经济学的中心批判，或者按照他所说的“纯理论的命题”，是它们并不具备可测试的隐含意义。

这些命题对于哈奇森来说，不是纯粹的同义反复，就是由于被臆断为根本性的“法则”，而被其余情况相同的条款如此地限制住，以至于对它们的阐释和测试都是无法进行的。然而哈奇森并没有清除所有对其余情况相同的条款的使用。他是准备承认它们在与经验归纳相关的使用中的作用，这些经验归纳已经在大量的场景中得到证实，但是不能在例外的情况中被人们所认识。

不过，这些情况可以被清楚地加以辨析和描述 (Hutchison, 1938: 46)。哈奇森倡导对其余情况相同之条款被许可使用的条件予以合法化，而经济学中的实践则恰恰相反；其余情况相同之条款被附加到经济学归纳之中，而这些归纳并非普遍适用。随之而来的是，由于经济学家很少对其归纳失败的环境予以辨析和分类，他们不能辨明何种干预是被其余情况相同之条款剔除在外的。

对于哈奇森来说，在经济学中有关其余情况相同之条款的标准使用是不可接受的。哈奇森选择予以批评的另一领域是被他自己称为“假定的”或者“孤立隔离”的方法，通过这一表述他的意思是指那种减少复杂情形，使之成为简化的情况的方法，其观点是通过“连续的估测”提供一种对实际情况的理解 (Hutchison, 1938: 43, 119~120)。

与这一批判之线索相关的是他对作为趋势判断之经济规律的批判。哈奇森所重复坚持的是“经济学家的言行举止应当开始向负责任的经验科学家那样转变” (Hausman, 1989: 118)。这只能在经济理论家们从抽象的、同义反复的和经验方面空虚而无知

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并且开始发展允许真实“进步”的经验规律时开始发生。

哈奇森的攻击使得圈内的许多人感到窘迫。哈奇森批判的中心议题是：传统的经济理论，更加具体地说，就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是否能够用当代科学哲学的标准来加以衡量？或者说换句话说，经济学界对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较高认定是否能够与通过经验数据得到认证的良好科学之要求并行不悖？对哈奇森挑战的初始反应是迅捷和充满敌意的。

弗兰克·奈特在被布劳格（Blaug, 1980a: 97）描述为“一篇狂野而令人困惑的长篇评论”（Frank Knight, 1940）中，攻击了哈奇森批判的实证主义基础。奈特争辩说，实证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从总体上低估了测试经济理论的复杂性，而且他们的科学哲学是无法单独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加以应用的。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需要涉及指导理性和行为的动机、价值和目标等问题。在重申他对理解之教条的坚持时，奈特批驳了科学方法的统一性，即逻辑实证主义的信条之一（Gonce, 1972）接踵而来的是哈奇森与奈特之间的一个简短而未加分析的交换，它对库恩式不一致性的范式例证进行了很好的预测（Hutchison, 1941, Knight, 1941）。然而，有趣的是注意哈奇森在那一交换之后将近 40 年所写出的经过思考的立场：

考虑到在那篇早期文章（《经济理论的意义及其基本假设》1938 年和 1960 年）中所表达的观点，我仍然支持经济学之可测试性和可证伪性的标准。然而，虽然这篇早期文章可以被称为，以 1938 年的标准来看，在许多方面一直是怀疑论者的作品，它的乐观的“自然主义”如今似乎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说，它的有关建议，比如“社会科学家”不当试图遵循科学方法，并且那些“成熟”的科学，只要它们

能够，尊重其物质之本质……经济学与物理学之间的这些差异是被看做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还是被看做是一个原则的问题，似乎并非十分重要。只要能够理解其充分的意义即可。然而，似乎产生高度误导的是，坚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特定的一般相似性（虽然此类一般相似性当然是存在的），而没有澄清这些差异在实践中是多么重要。

(Hutchison, 1977: 151)

哈奇森经过重新思考的立场表现出一种良好模式的平衡，这种平衡位于实证主义之正确性和波普尔式可测试性和可证伪性标准的持续强调之间，同时凸现出这两大科学体系之间的实际差异。

除了哈奇森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工作之外，与一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知识方面相匹配的，即使不是直接由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提供信息的另一发展，便是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如同在他对经济学的早期贡献中所包含的那样）。

更为具体的是，这些早期贡献是由他的博士论文所构成的，开始于 1947 年，出版于 1948 年 (Samuelson, 1948a)，伴随着他的有关显示性偏好理论 (Samuelson, 1938, 1948b)。他出版的学位论文所具有中心目标之一是经济学中“有意义之操作定理”的衍生。

萨缪尔森通过有意义的定理想要表述的是，“只不过是一个有关经验数据的假说，只要具备理想的条件，它就能够想像地被予以否定” (Samuelson, 1948a: 4)。萨缪尔森有关操作主义的理念并不能够与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 (Bridgman, 1927, 1938) 相等同。

操作主义 (operationalism)，如同布里奇曼所阐述的那样，争辩的是将一种科学理论的抽象概念与实体衡量之实验方法相联

系的相关规则的构建布劳格阐释了萨缪尔森有关有意义的操作定理的定义，并且通过隐含意义，他的操作主义接近“以维也纳圈内语言所表达的波普尔式证伪主义”（Blaug, 1980a: 100）。

更接近目前的是，豪斯曼（1992）提供了对于萨缪尔森操作主义的更加敏锐的批判。豪斯曼正确地争辩说，萨缪尔森正在为经济学理论提出一个激进的行为主义基础，正如在萨缪尔森的显示性偏好理论中所反映出的那样，但是“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学家（当然不是萨缪尔森自己）在做这样的行为主义理论化工作”（Hausman, 1992 : 157）。

豪斯曼进一步争辩说，萨缪尔森所提出的一般方法论的观点，迄今为止有可能以经验性隐含意义的正确体现所替代的理论，是“不连贯和没有帮助的，并且试图实施它意味着放弃所有的经济理论”（同上：157）。从米洛斯基对萨缪尔森方法论的分析（Mirowski, 1989b），豪斯曼发现一个鲜明的对比，事实上就是“当代经济学方法论之精神分裂症中一个生动的范例”（同上：158），萨缪尔森把理论精简为经验性后果的方法论诀窍和他那“具有许多伪装的经验性隐含意义的理论理想化与简化的应用”（同上）。

马克卢普挑战萨缪尔森在方法论诀窍与其实践之间的不一致性（Machlup, 1964），萨缪尔森的答复是：“科学家不断地利用寓言、范式、强极模型（strong polar model）来帮助理解更为复杂的现实在多大程度上这些是利大于弊始终是一个敞开的问题，与其说像一门科学，不如说像一门艺术。”（Samuelson, 1964 : 739）。

这也许会出现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反映，并且为了试图提供一种解释，豪斯曼推测萨缪尔森的不一致性部分地是由于他把一种理论等同于其经验性后果的信仰被“最新科学哲学”所预先指定。给定他拒绝“摒弃这一权威”并且他未能“在行为主义的边

界内包含他的经济理论化，萨缪尔森的矛盾便持续下去（Hausman, 1992 : 158）。

经济学界对于哈奇森批判和萨缪尔森操作主义计划的反应在 20 世纪 40 年代浮现出来，这是以集中的经验性研究为特征的，此类研究试图测试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性命题，尤其是有关企业的新古典理论。比如说在英国的豪尔和希奇（1939）或者在美国的莱斯特的理论（1946, 1947）。

他们的结果质疑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关键性命题的可接受性，吸引注意力并且引发一种直接反应。这些在马克卢普的著作（Machlup, 1946, 1947）中得到很好的体现。马克卢普对正在出现的批判的直接反应是用一篇方法论的文章来指责它，这篇文章坚持要求对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直接测试，而不是集中在它们的经验性后果上。

对于马克卢普来说，没有一种直接的方法可以测试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人们只能通过测试经使用而衍生出的经验性隐含意义来间接地测试它们。在捍卫这一立场时，马克卢普呼吁当代科学哲学捍卫他的观点，即理论只应当通过有关其能量的参考依据来加以评价，以便产生正确的经验性隐含意义。

马克卢普的平衡反映在后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作品之中，这些作者接受了理论在物理学中的作用，它包含着不可观察的实体存在，然而产生了正确的经验性隐含意义。相似地，经济学应当认识到理论的可接受性，虽然并不是能够直接测试它们的基本假设但提供了正确的经验性观察。

马克卢普的方法论作品包含许多含混不清的东西及其立场的微妙变动，这种立场是难以用他的全面立场的劲头来进行调和的，但是通过对于逻辑经验主义者之科学哲学著作的明智应用，反映出被他认为是超经验主义者对于经济学所进行的最具有破坏性能量的攻击。

无论如何，并不是马克卢普的作品占据了战后时期经济学方法论思维的主导地位，而是弗里德曼发表于 1953 年的文章《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Friedman, 1953）。对于这篇文章的描述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战后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作品”（Blaug, 1980a: 103），“或许是经济学方法论作品中已知的最好作品……一篇具有广泛市场的杰作”（Caldwell, 1982: 173），而豪斯曼则把它描述为“本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方法论阐述”（Hausman, 1992: 162）。

它的影响力是易于理解的，产生于评论家中间并得到一般认同的是这样一篇有关方法论的文章，也许是惟一的一篇，这是差不多所有经济学家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所阅读过的文章。弗里德曼这篇文章的中心信息被大多数实践经济学家所迅速吸收，等于为经济学界提供了一份方法论宣言它的被接受程度呈现出一种令人好奇的难解之谜：在实践经济学家中被当作一种解放的含义而受到欢迎（Hausman, 1992: 164）。

这一意义上的方法论解放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明，从一个仍然感受到来自哈奇森哲学批判的行业来说，该批判反过来得到来自英国的豪尔（Hall）和希奇（Hitch）以及美国的莱斯特（Lester）之经验主义研究的支持。

然而在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作者中，弗里德曼的文章仅仅赢得了寥寥无几的热情倾慕者。这篇文章的鲜明特点是自其发表以来的 40 多年里，它引发了持续不断的批评评价和阐释（Hausman, 1992: 163）。给定它的风格与内容，对于弗里德曼文章的这一反应几乎没有任何引起惊讶之处。

作为一篇文章，它保持了一种经济学方法论领域中作品的更为令人迷惑的写作样式；有时在坚持经济学中正确的理论测试的标准方面是具有约定俗成之实用性的，它与微妙的资质、模糊性和缺乏任何与当代科学哲学文献作品相对的参照物相联系，由此

这些文献将对其思想产生人所共知的影响。

预测能力而不是解释能力是弗里德曼所声明的实证科学目标，比如说经济学以及整体对弗里德曼工具主义立场的接受是假设争论之唯实论的累赘（Boland, 1979）。于是弗里德曼能够争辩说 20 世纪 40 年代期间所出现的经验性批判的整体目标，错在它试图评价新古典理论的“假设”而不是其预测。

通过评价其预测来测试理论并拒绝争论，弗里德曼不仅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当代批判作出了回应，而且还分化瓦解了经济学界的批判传统，而该传统可以回溯到德国历史学派，并且在美国可以回溯到美国制度学派（Schumpeter, 1954; Backhouse, 1985）。

这一批判传统质疑了抽象理论的价值，并且反对了那种被争辩为非理性的与新古典理论中非唯实论的假说。弗里德曼对新古典理论的“工具主义”辩护有助于摒弃所有此类从根本上误导和混淆的批判。

当布劳格对围绕着弗里德曼文章的整个辩论予以回顾时，他“被展示出的缺乏方法论的精深”所震撼，并且争辩说被利用的非精深的立场“只能作为对长达一个世纪的似是而非的理论进行批判性轰击的一种反应”（Blaug, 1980a: 120）但是似是而非的理论之方法论基础的非精深状态，在我们反映在库普曼对于流行中之矛盾的识别诊断上得到明显的凸现，显示在他在写作中涉及罗宾斯和弗里德曼对方法论的贡献时：

在一个多世纪的科学经济学集中活动之后，两位对我们的科学曾经作出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于经济政策问题的立场并非有很大差异，他们都在寻求经济学知识的最终基础，并且伴随着以下思考：（1）相互矛盾；（2）相互从属于强烈的否定。人们被引导到将经济学总结为一种有点像飘

浮在空中的……科学学科。我们两位作者如此强烈（而又矛盾）地坚持的立场所具有的共同点是，鉴于迄今为止二者都没有被采用，其效应是保守的效应……在任一情况下围绕的论点和盾牌收到的是带有不堪一击之外观的经济理论，它既不是被完全正义化了，也完全不是所需要的。

(Koopman, 1957: 141~142)

在此处库普曼把吸引力集中到这样一个事实上，即似是而非的新古典理论之方法论基础被认为是相当得意地栖身于两种相互不兼容的科学哲学的共存状态：罗宾斯的推理和演绎视角，附有针对性对经济理论之根本假定的正确性，以及弗里德曼对于假设唯实论的工具主义反驳，予以本体论的认同。如同萨拉提不无远见地指出（Salati, 1989）的那样，除了罗宾斯与弗里德曼相互冲突的视角之间的根本差异无法调和之外，二者的方法论立场与当前流行的科学哲学之间也有分歧：逻辑经验主义的成熟版本或者当时可以获得的波普尔著作的一部分

波普尔式的插曲：实证主义的灭亡

波普尔已经承认了自己在扼杀逻辑实证主义中的作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可以声称已经播下了它毁灭的种子（Popper, 1976a）。一方面他的意图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毁灭，他的惟一意图是“要指出对我来说似乎是许多根本性失误的东西”（Popper, 1976a: 88）。这就印证了帕斯莫尔的观点，即逻辑实证主义的解体是由于内部困难（Passmore, 1967, 1968）。随后而来之事务的出现，一般是指作为‘知识增长’的传统，已被证明对经济学家、经济学方法论专家和经济思想史学家具有特别吸引力的。德

·马奇已经描述了波普尔专为经济学家保持的科学哲学的潜在诱惑力：

除了他不得不说的东西被看做是逻辑关系和阐释之属性的东西之外，他展示了一种批判性的态度。无论是事实还是理论都只不过是识别错误过程中的一个因素。这对经济学家来说是以一种特殊方式进行的解放。

波普尔有关经验性内容以及对理论化之认识论先决条件的均衡坚持有可能已经得到裁减，以呼吁某一学科中的实践者。在该学科中实验是困难并且是不确定的，而理论似乎是更加坚实的，然而在数字被看做是应用理论去产生用于对决策的劝告所必需时，他对方法论传统—游戏规则的强调，对于一批焦急地想要为人所用并且向多少有点勉强的公众表白自己，然而意识到他们振振有辞中的谬误性的社会科学家是有用的。简而言之，与科学哲学中许多作品相对照，波普尔的作品不仅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是可接近的，而且看起来也是相关的。

(De Marchi, 1988: 4)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波普尔的作品也许一直是可接近的，并且被认为是相关的，那么，它是否可以在实践中加以实施呢？

经济学方法论专家和经济史学家带着热情向波普尔靠拢。在经济学方法论专家中，波普尔式证伪主义的最早和最为一贯的信徒之一是哈奇森。哈奇森在他 1938 年出版的种子性著作《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说》中，引入可测试性作为一种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

在贯穿其后期的著作中，哈奇森保持了他对波普尔式计划的承诺 (Hutchison, 1964, 1968, 1977, 1978, 1981)。正是在波